

时事透视 张优远 黄国和

## 通过共识制定新加坡的基本生活标准

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能通过讨论来制定一套属于新加坡的基本生活标准吗？

当收入和财富水平、社会地位和角色、以及日常生活都不相同，新加坡人还能够对于基本生活标准达成共识吗？

他们该如何决定在现今的新加坡，什么是必需品，而什么更像是奢侈品？

这些是我们在2017年，展开“最低收入标准”（Minimum Income Standards）研究时心中的疑问。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依靠小组讨论，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共识。这个研究方法由英国拉夫伯勒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Social Policy）在2008年首次采用。近年，爱尔兰、法国、葡萄牙、南非、墨西哥、日本和泰国，都有研究团队应用这种研究方法计算不同类型家庭的所需预算。

这项研究重视民众的生活经历，能够了解基本需要背后的社会规范，搜集数据和细节也特别严谨。对于仍存在贫富差距的新加坡社会来说，这些优势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在这四年和两轮的研究中（包括36个小组，共299名参与者），我们花了数百个小时聆听小组的讨论，并翻阅笔录。年长者诉说他们使用手机时闹过的笑话，还有对于后辈的短信的不解（“甚至没有ok，只有k！”）。家长解释在网上购买婴儿游戏垫更便宜、更省时；单亲家长分享他们有时候需要适度善待自己，因为身兼母职和父职是多么艰难。

在服装和化妆品方面，人们确实有不同的品味和风格。有些人喜欢请朋友来家里吃饭，有些人喜欢在外头和家人聚餐，还有其他人选择独处。有些人认为每年到邻近国家旅游对精神健康至关重要；而其他人，如很多新加坡人一样，则偏向把钱存起来，每隔几年到更远的地方，满足多看世界的愿望。

年轻人笑着告诉这个由中年人组成的研究团队，泡泡茶不仅是饮料，也是社交活动。与朋友或同事走一趟泡泡茶店，也能乐在其中。

### 就何谓基本需要达成共识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多元社会难免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差异，参与者仍能够一致同意，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人必定有同样的基本需要。

在某些方面（如装扮），由于个人偏好较重，小组偶尔无法决定详细的物品清单。尽管如此，他们仍能够一致的决定该类别所需的预算。

连接参与者的是一份认同。他们所认同的，是所有人对于归属感、尊重、自主、独立和社会参与

的需要。参与者的一切决定都是基于这些需要。

饰品、旅游和到餐厅用餐是富人才有权享受的奢侈品吗？

参与者明确表示：“绝对不是”。他们分配给这些项目的预算实在不高（饰品每年50元，用于购买发夹、耳环、胸针等）。他们也陈述了这些东西在我们社会氛围中的意义。

### 对教育制度的焦虑

有时候，从他们的考量中，我们听出了无奈。比方说，来自各行各业的父母都对教育制度表示焦虑和担忧。孩子真的需要上补习班吗？我们得到毫无犹豫的回答：“需要”。没有补习班，孩子就无法跟上课程的进度。孩子们经常要求补习，身为父母必然无法拒绝。有时学校老师也会建议这样做。

我们反复询问，试图理解理由：如果孩子没有补习会怎样？一位参与者说出了其他人的想法，让大家笑了起来：“如果新加坡不再考试，上学只是玩耍、学习，没有任何人唯贤价值观，没有小学离校考试，没有A水准考试，那么我就认为没必要补习。不幸的是，在新加坡，分数和成绩就是一切。”

由慈善团体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补习班是否足以满足需要？经过讨论，参与者不同意，因为这类补习班未必所有孩子都能参加，也可能无法达到学业较弱势的孩子的学习需要。

同样的，增广课程也被列为基本需求。我们问，既然有课外活动了，为什么还需要这些课程？家长们有些激动地说，要录取感兴趣的课外活动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学校往往只挑选有能力参加校际比赛的孩子。因此，孩子必须通过其他管道追求个人的兴趣。

尽管实际消费能力和习惯存在差异，参与者都同意补习班和增广课程是基本需要，也指出这非常符合现实社会情况。父母的苦心显而易见，他们当然宁愿把钱花在其他家庭开销。可是，他们同时意识到孩子需要安全感，不希望自己掉队。无可奈何地，这成为了家长和孩子的需要。

### 大学教育是基本需要

参与者当然意识到，不是每个新加坡人都有能力达到基本生活标准。这方面，我们从年轻人身上获得了很深的体悟。谈到19岁至25岁的青年，他们认为大学学位是将会决定前途的必需品。

他们并不天真。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与父母对补习班的担忧一样，年

轻人以亲身经验告知，不同价格和质量的补习班效果不齐，这某程度上决定了谁能上大学。但是，部分人没法获得的，并不意味着就不是需要。

他们强调，在现今的新加坡，如果没有大学学位，工作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 跨阶级的互动

在参与者当中，有些人显然过得较舒适，而有些人的生活则低于基本生活标准。当他们聚在一起进行讨论时，之间的互动需要有经验的研究员谨慎的处理。

在新加坡，跨阶级的互动并不常见。而我们在研究中，不仅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放在一起，谈论的还是钱。谈到必需品和价位时，难免会想到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哪些东西是否“太便宜”或“太贵”。

所以我们采用案例来提醒参与者，我们谈论的是“K先生”、“K女士”或“孩子Z”，而不是“你”。当他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生活状况，如习惯豪华或依赖赠品时，我们会强调讨论的目的是建立社会所有人可接受的基本线。什么才算是需要？为什么需要？如果“孩子Z”没有它会怎样？我们必须首先澄清什么是需要，才能思考如何满足它。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引导讨论，让参与者有空间细述个人经历，也避免炫耀或引起羞耻感的言论。

在这四年，我们从参与者的分享中学习，今天生活在新加坡的每个人都需要住房、食物和衣着、教育和就业机会、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医疗保健。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尊重、安全感和独立。每个人都需要参与社会活动的选择，以及参与文化和宗教活动的自由。

他们明白在新加坡并非每个人都能满足这些需要。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不是需要。反而，他们认为不是只有负担得起的人才应该享有归属感、尊重、安全感和独立；并不是只有部分孩子应该享有适合自己学习进度的付费补习班，而其他孩子就应该接受任何符合家里经济情况的补习班。

这项研究其实是一种委托。既然研究团队从参与者身上学习了这么多，我们就有责任提问：如果民众已经清楚意识到什么是需要，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既然已经知道基本生活标准是什么，今后的目标就应该是确保每个人都能达到。

张优远是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社会学系主任，黄国和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和个案研究组组长。这篇评论摘自与梁尤薇、艾德（Ad Maulod）、卓君美和黄依乐合作完成的《新加坡人的需要：家庭预算报告》，报告在本月初公布。